

第一章 导论

美国著名的价值哲学家 R·李卜莱曾经说过：“今天，在科学和力量的世界上，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合作，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有关价值形态和价值本质的研究更为重要的了。”^① 美国著名的未来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关键是价值观问题。一个人必须知道需要什么，才能考虑如何去做。”^② 李卜莱、贝尔所说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价值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一定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价值分为手段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这两大类。手段性价值，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被称之为“力”；目的性价值，大致上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德”。“力”与“德”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是伦理本位的，因而其主要倾向也是重“德”轻“力”。在当今世界上，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每一个人、集团和国家都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实力），所以人类力量的增长是

① R·李卜莱：《价值语言》转引自杨祯：《价值学简介》载《现代外国哲学》（3）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丹尼·尔贝：《〈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序》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必然的，并且从总体上看是单向的，即增长、增长、不可遏制地增长。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被人们认为是亟需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它建成；只要被人们认为是最不需要的、最有害的东西，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将它毁灭。人们不但可以造物、建城，而且可以造人，可以用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人”。人将变得比神话中的神、科幻中的“未来人”还厉害！这种情况使相当多的人认为，市场竞争中的胜败主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许多人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往往重视力量而忽视正当的价值取向，甚至采取反向的价值取向。这样，价值观，特别是价值取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可能沿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发展是双向的、多维的。如果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力量被具有正当价值观、价值取向的人们所支配，那么人就会是一些健康的人，世界也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假如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力量被希特勒这样的具有反动价值观、价值取向的人们所支配，那么人就可能成为疯狂的、惨无人道的人，世界就可能变为悲惨的世界。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卜莱和贝尔才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价值形态和价值观问题。

第一节 价值观及价值研究

我们所做的这项关于体制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人的价值观研

究，是一项社区价值观研究。而要进行社区价值观的调查研究，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价值观。对此，我们从价值观的涵义、内容以及价值观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这三方面做简略的阐述。

一、价值观的涵义及其地位

所谓价值观 通俗地说 就是人们对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什么是“ 应当的 ”什么是“ 不应当的 ”什么是“ 值得的 ”什么是“ 不值得的 ”的看法或观点。但在学理上看，价值观却是一个具有深奥哲理的、十分复杂的问题。

西方古代哲学是包罗万象的一门学问，它将对一切事物的探究都纳入哲学的范围。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在总结柏拉图等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哲学有三部分，就是物理学、伦理学与逻辑学。当我们考察宇宙同它所包含的东西时，便是物理学 从事考虑人的生活时 便是伦理学 当考虑到理性时 便是逻辑学 或者也叫做辩证法。”^①直到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仍坚持这种哲学 学问 的三分法。古代和近代的“ 伦理学 ”、“ 道德哲学 ”、“ 实践哲学 ”和“ 实践理性 ”学说 实际上都是指以哲学或综合的方式探讨人文和社会的一大类学问，其所涉及的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渗透于这些领域并将这些领域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性的价值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 371 页。

至近代和现代，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先后从包罗万象的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是，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哲学、价值理论，仍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一个共同的综合性的问题。正如当代著名价值学家 S.C· 珮珀所说的那样：“价值理论是为一组所谓价值学科的共同问题所起的名称。这些学科包括伦理学、美学、知识理论和逻辑学的某些方面、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由于专门化，这些学科彼此日益分离了。价值理论是跟这种分离倾向相反的运动，要从这些学科中抽取共同的问题和核心。”^① 因此，作为价值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问题，至今仍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和探讨的一个具有普通性的共同问题；只是各自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价值观念（价值观）不同于事实观念。事实观念只是认知的结果，它只涉及人的认知能力，如感知能力、理智与认知对象的关系。它主要解决认知对象“是什么”、“是怎样”、“为什么”之类的事实性问题，获得关于认知对象的知识。它要求尽可能按对象本身的本来面目原原本本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既不对对象增加什么，也不对对象减少什么。而价值观念不但包含着人的认知能力、认知状态与认知对象的关系，而且包含着人的需要与所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人的情感与所感受对象之间的关系、人的意志与所追求或拒斥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价值观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以下一些环节：一是认识对象“是怎样”；二是认识对象与自身需要、感受（体验）的关系“是怎样”；三是

^① S.C· 珮珀：《价值源泉》转引自杨祯钦：《价值学简介》载《现代外国哲学》（3）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通过衡量对象与自身需要、情感、意志之间关系是否适合、适意（它往往表现为快乐或痛苦的感受及相应的情感）而形成的喜欢或厌恶的价值性态度。四是在构想、想象这种关系“应当怎样”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性评价。五是将各种通过“应当怎样”的设想所构思的各种情境进行需要与可能相统一的理性评价（值不值得）比较和选择。最后形成所认定、认可的“最好怎样”的价值性的意向和行为取向（价值取向）。在价值形成的这五个环节中，涉及三方面变量的相互作用：一是主体的情境变量，如认知、情感、意志等；二是客体的刺激变量，如物质、能量、信息对人的刺激作用等；三是客观环境背景变量，如所处的客观的环境、氛围、条件等。而将这三方面变量结合在一起并使之相互作用的则是人的活动。价值观所要解决的是“应当怎样”、“最好怎样”的问题。它是在一定认知、事实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喜欢或厌恶的态度、“应当怎样”的构想及“值不值得”的评价、选择认可的意向所形成的以人为中心的、为了人的、关于“好”或“不好”和“值得不值得”的观念。它所追求的是关于“善”（广义）关于价值的意识。其中起始性的环节是喜欢或厌恶的态度和“应当怎样”设想的产生。而“值得不值得”的评价，则包含着收益与成本、获得与代价之间的计算和权衡；“最好怎样”（“要怎样做”）的价值取向则是直接趋于实践、观念向行动转化的枢纽。

由于价值观念是主体的情境变量、客体的刺激变量和客观的环境变量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不是只像认知那样原原本本地把握客观对象，而是在把握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改造对象。“应当”意味着对现存状况的某种扬弃、否定，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改变、改造现存状况的观念。但是，只凭这种观念改变不了

现存状况。要改变现存状况，必须由使用物质力量的人进行现实的改变世界的活动。因而要想实现“应当怎样”、“最好怎样”的理想状况，人必须进一步设计和考虑自己“应当怎样”、“最好怎样”去行动（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念不但是—种源于实践、关于实践的观念，而且是一种趋于实践、归于实践观念。所谓实践，其原本的意义就是在某种价值观念的导引下追求、创造和利用价值的活动。价值观念的形成意味某种行动将要开始。而对行动的预想中，什么事值得做，什么事不值得做，沿着这个方向去行动还是沿着那个方向去行动，以这样方式去行动还是以那样的方式去行动，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一种动态和定向化的趋于实践的价值观念。因而，准确地把握人们的价值观，不但是自觉地构建引导人们去正确行动的价值观念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把握人们的价值取向而预测人们的行动以及由人的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

在一定的事实前提下，价值决定着人类是否去行动，如何去行动。在行动中，人们才去利用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价值观支配人，人支配各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是一种支配力量的力量。价值观是人类行为之舵，也是人类行动的发动机。人类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行动，而人类今天的行动又取决于我们当前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国，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学者、科学家和有识之士都认为，21世纪最有能力影响人类命运和世界前景的是价值和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其中最要紧的问题则是重塑人们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上的著名政治领袖和政治学学者都把重塑新的价值观作为跨入21世纪的治国、治世的纲领。

二、价值观的内容及其分类

有的价值观研究者认为 人类有多少种活动领域 就有多少种价值观。而在实际上,在一个活动领域中就会有许多种价值观。因为人的主体情境变量、客体刺激变量和客观环境变量都是多维的,由它们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价值观就更为纷纭复杂、异彩纷呈了。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价值观都是多元的、多样的。但是,多元的价值观是具有共同性、统一性的,因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类。价值观的研究者们曾对价值观内容的分类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研究者的分类虽然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他们对价值观内容分类的角度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适应基础研究需要的学理性的分类法;另一类是适应应用、开发研究的实证性、操作性的分类法。

从学理性的角度对价值观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不同需要做各种不同的分类 按其性质 可分为肯定性的(正确的)或否定性的(错误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正义的(正当的)或非正义的(非正当的)按其能级(能量级别)可分适度的或不适度(过度和不及)的、高级的或低级的、较大的或较小的 按其层次 可分为内在的或外在的、整体的和局部的、集体的或个人的、高层的或低层的;按其序列 可分为在先的(优先的)或在后的(靠后的)暂时的或长久的、主要的或次要的 等等。

价值观的性质是其质的方面的规定 而价值观的能级、层次和序列则是价值量的方面的规定,它们分别是力度、空间和时间对价值观的存在方式的规定。从最一般的即哲学的角度对价值观进

行分类，应该以价值观的性质为主，同时兼顾价值观的量的方面。价值观的质和价值观的量在结构上的统一，就是价值观的类型。因此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对价值观进行基本的分类应主要采取综合的（综合性质、能级、层次、序列等方面）多维化的方法依据价值观类型上的区别进行分类。

我们认为，可以从情境、刺激和环境三种变量相互作用的角度，根据价值观所对应的不同环节，从学理上将价值观分三大类：一是主体性价值观如关于人的真、善、美等方面的看法和评价；二是客体价值观如对各种客体的功能（质能、动能、信息等）满足主体需要的性质和程度等的看法和评价；三是中介性价值观如作为沟通主体需要与客体功能之中介的能力、工具、手段如具有物品运输功能的交通工具、具有信息交流功能的通讯工具、具有交往功能的中介组织的看法和评价。在实践中这三种价值观经常是相互渗透的。

从实证性、操作性的角度对价值观进行分类，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所采取的做法。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一般将价值观分个体社会性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这三个分析层面。个体社会性价值观是个体的社会化了的价值观念体系。美国学者克拉克洪将其理解为“一种影响选择的建构”。杨中芳认为它包括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三个层次。社会价值观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①所谓文化

杨中芳：《中国人真是集体主义的吗——试论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价值观 社会科学观点》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4年版 第22页。

价值观 是指共存于一定文化——社会体系的成员之中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按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说法，这是一种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 是个体在社会化、价值化的过程中内化于自身的一整套与社会需要、社会秩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观 才使社会成员 个体 由于在被教导中接受了共享的价值观念，并具有某种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和价值取向的协调性。

三、价值观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社会历史是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创造的。而人又是为了获得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而去进行创造性活动的 因而 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创造和利用价值的实践活动“ 实践 ”这一概念的原义就是指追求、创造和享用价值的活动)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历史本质上也是一个不同于史前天然自然的价值体系。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制度、精神 就是所谓的文化。所以 英国人类学家 K· 费多斯认为 文化就是社会 社会是什么 文化就是什么。^①前苏联著名哲学家 H· 恰夫恰瓦泽认为：人的本质表现在他的自由创造价值的活动中“；人的自由创造活动……以价值为方向 受价值的决定。”人通过创造价值塑造自身 并创造文化和社会 文化和社会是具体化的价值领域。因而 只能通过进行创造的人、人所创造的价值来理解文化和社会历史 我们也只能从文

参见刘豪兴主编：《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15 页。

化、社会历史这些具体化的价值领域才能发现价值，从文化、社会历史形成所体现的价值来理解人。^① 据此，我们认为，价值、价值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所应着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价值与人、社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在哲学的指导下，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价值及价值观问题，可能是一个更为恰当的研究视角。也正因如此，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在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一直是一个比较兴盛的热点。

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研究价值观的事例和成果不胜枚举。与我们这项研究较为接近并且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例：一是 1978—1982 年由比利时的让·凯尔克霍夫斯教授牵头的“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进行的“欧洲价值体系调查”。这项调查从探索到完成历时 5 年，从欧洲 9 国（英、法、意、西德、西、荷、比、丹麦、爱尔兰）中收到了 12463 张答卷。经过分析，产生了约 250 万个数据。该项调查研究总报告《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于 1982 年由法国的让·斯托策尔教授撰写，于 1983 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此后欧洲 9 国的调研报告也陆续成书。《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除前言和附录外共 10 章，题目依次为：“道德”；“政治——左和右的选择”；“政治——情感和运动”；“宗教”；“家庭价值”；“价值与劳动”；“个人、世界与他人”；“客观条件的影响”；“价值与年龄”；“九个国家，一个欧洲”。此项调查的指标设计较为全面，调查表包括 246 个问题、

^① [苏] H·恰夫恰瓦泽：《人、文化·价值》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 年第 12 期。

39个标尺量表和若干说明社会一人口状况的问题是一项规模较大而又较为详尽的跨国价值观调查。这个“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还准备今后定期进行这样的调查，以便发现和确定欧洲价值观演变的轨迹。二是1980年由比利时的霍夫斯特德教授牵头的“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调查。此项调查运用了“权力差距”（社会容许在机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回避不确定性”（社会对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缺乏容忍的程度）、“个人主义”（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男性化”（两性之间的角色分配和气质差异）这四个价值观测量维度，使用了20种不同的语言版本，每份问卷有150多个问题，涉及到50种职业和66个国籍的人，收回11.6万份答卷。通过对这些答卷的简单相关分析和因素分析，发现在有关价值观的各个问题上在国家（文化）层次上的相关与个体（人格）层次上的相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项调查既涉及到发达国家，也涉及发展中国家，但没有涉及到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项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跨文化的价值观调查。它从人类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出发来进行价值观的分类测量，通过社会调查和跨学科的研究，揭示了价值观这一国际社会的深层结构。

我国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大都是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价值观的研究，最初源于使用和借鉴外国的价值观量表和相关理论进行的研究。从70年代末才开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价值观研究。其中主要有章海山关于当代道德的转型和构建的研究；陆建华的社区青年价值观的调查研究；廖申白等人的转型时期社会伦理与道德的调查研究；李萍、钟明华等人的开放地区大学生道德问题研究；吴灿新关于珠江三角洲人的价值观嬗变的研究；刘善仕等人关于“三

资”企业青年的价值体系调查研究；杨宜音关于价值观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李银河关于婚育家庭价值观的研究等。此外，港台地区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黄光国、杨中芳、高尚仁、肖新煌、李庆善、郑伯坝、叶光辉、余安邦、翟学伟等学者，也在研究中国人价值观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总的来看，我国对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缺乏宏观的和长期的动态性跟踪研究，对价值观演变、变迁也缺乏具有实证性的序列研究。此外，由于科研体制和科研建制以及学科评价等方面的原因，霍布斯特德在进行“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调研时所指出的一个“典型错误”——学科门户之见和学科分割研究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由此造成了视野狭窄、研究方法单一、观点简单片面等弊端，形不成多学科协作研究的优势，只有单一学科的体内循环和相近学科的近亲繁殖。这些都应该在以后的价值观研究中，通过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避免。如前所述，价值观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交叉边缘学科所共同面临的综合性问题，只有通过各学科的联合、协作，取长补短，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的体制转轨 与价值观嬗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活动、与人物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

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 珠江三角洲人价值观的嬗变，也是他们对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实际生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变化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其中由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价值关系、价值体系的深刻变化，是珠江三角洲人价值观念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文化与珠江三角洲人

1. 珠江三角洲概况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珠江下游 毗邻港澳 靠近南亚 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它是我国人口、城镇密集和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 3 个地区之一；也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国际上的经济、文化交往较为频繁。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城市连绵区。1979 年我国首次建立 4 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深圳和珠海就占其二。1984 年 4 月广州市又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1985 年珠江三角洲“小三角”共 17 个县市被辟为全国 3 个沿海经济开放区之一。到 1987 年 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又从“小三角”扩大到“大三角”共 25 个城市、3 个县、452 个建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2、31 页。

镇,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肇庆以及清远这 10 个地区(副省级市)总面积 41698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23.4%。至 1998 年底,户籍总人口为 2238 万人,占全省的 32% 平均每平方公里 537 人。包括地理上应属于珠江三角洲的港澳地区,则总面积达 42819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 2950 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689 人。城镇密度为 108 个/万平方公里。我们的调研范围只限于不包括港澳在内的“大三角”地区。1994 年 10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又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1999 年 8 月,又被国家科技部列为首批试点全国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带之一。

本社区不包括港澳的现代化程度较高 城市化率 1998 年已达 47.6% 高于全省 11.6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15.4 个百分点。至 2000 年底 本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达 53% 以上。

珠江三角洲地处广东省核心 自然条件优越 经济基础好 具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独特条件。本地区土地肥沃 河网密布 气候温和 濒临南海 海岸线长 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历史上珠江三角洲对外开放较早,在秦代就已通过广州(当时叫番禺)对外通商 农业商品经济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早得多 手工业和日用杂货闻名省内以及海外。现在的珠江三角洲人口稠密,外来人口庞大 劳动力充足 区内水陆空交通线路发达 与香港、澳门的商品、资金市场近在咫尺 海外华侨和华人众多 外向型企业发展迅速,对外经济十分活跃。该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已成为全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区。

经济基础较好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持续高速发展。1981—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 17% 高于广东省

14% 和全国 9% 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10% 左右）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富裕的地区。1998 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 5833 亿元 人均 26063 元 为广东平均水平的 2.3 倍 全国的 4.1 倍 高于京津唐、辽中南、长江三角洲、胶东等地区。其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值、外汇收入以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指标均占全省的 7 成左右；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外贸出口基地、金融和商贸中心、旅游中心、交通运输枢纽之一，其经济辐射力超出广东、华南，成为我国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区。

2. 珠江三角洲文化

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质，在于它有一个主导的精神和统一的风格。作为岭南文化代表的珠江三角洲文化就具备了这种特质。

在先秦时期，就有石器时代的先民文化和远古时代的百越文化。这些文化虽在体质上和气质上极大地影响了岭南人，但却不具有岭南文化的主导精神和统一风格。岭南文化从秦代汉人涌入岭南开始孕育，直到明末清初“岭南三家”（屈大均——广东番禺人 陈恭尹——广东顺德人 梁佩兰——广东南海人）出现，岭南文化才开始形成，并以独特的形态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 1840 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由于珠江三角洲是接触西方文化最早并且最多的地区，所以出现了许多学贯中西的人才，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企图引进西方文化改造旧中国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洪秀全（广东花县人）把西方基督教义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

起来，并用新的宗教去组织民众，掀起了一场历时 14 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反清运动。以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将西学与儒学相结合的“改制”、“大同”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发动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摒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主义，以自己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三民主义为指导，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此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新闻报刊家和科学家，也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技、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公元前 2 世纪在番禺开辟的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到明末清初以“岭南三家”出现为标志的岭南文化的形成，再到近代开全国风气之先的中西结合的政治思想和革命运动以及新文化的出现，岭南文化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主导精神和统一风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岭南文化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是珠江三角洲人，并且是在珠江三角洲这块热土上孕育发展起来并传播出去的。所以岭南文化的主体是珠江三角洲文化。

体现珠江三角洲文化特质的主导精神和统一风格是什么？郑刚先生对此做了深层次的概括。他认为，岭南文化（主要指珠江三角洲文化）的“主导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革命精神和革新精神。这种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上。”

郑刚：《岭南文化向何处去——广东、香港的现时危机与未来选择》，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9 页。

以屈大均为代表的‘岭南三家’是在反清斗争中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文化舞台的。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主持的变法维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又进一步将这种主导精神贯彻于革命和革新、思想创造和实际运动中。这种精神不但体现在社会政治意识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艺术的革新、经济活动的创新上。与这种主导精神相一致，它的统一风格则体现在：“在对象、材料、意念、意象上力求生猛，也就是求新鲜、奇异和精美、彻底和有力度。这种统一风格是北方的大度、醇和和江南的柔美、雅致所不具有的。……这与岭南人的生猛海鲜是一脉相承的。”^①猛，是其猛烈、有力的一面，它有如岭南的台风暴雨；生，是其新鲜、奇异的一面，有点像岭南的饮食等习俗。岭南人对于吃总是求新、求鲜。其他地区的人不敢吃的，求新的岭南人也想办法摆上餐台。岭南人爱吃蛇就是典型的一例。岭南人的求鲜，从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谚语也可以看出来：“吃鸡吃叫的，吃鱼吃跳的”。在冬季似春，三季如夏的岭南，食物搁久（旧）了就发霉、腐烂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岭南人“喜新厌旧”的进取、革新的价值观。

3. 珠江三角洲人的文化心态

与珠江三角洲文化、岭南文化的形成机制和文化特质相一致，珠江三角洲人也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 开放型的文化心态。处于珠江三角洲中心的广州（秦代称番禺）公元前 2 世纪就开辟了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与西方的交往更加频繁；在首批出国留学学生的

郑刚：《岭南文化向何处去——广东、香港的现时危机与未来选择》，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0 页。